

【特稿】

引言

朱鴻林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黃一農院士多年來隨處施教，鼓吹研究傳統中國文史的學者，應該與時並進、運用他所揭示的「e 考據」方法，完善對古籍文本的掌握，從而提高辯證事物正誤真偽的能力，做到有疑必祛，無徵不信境地。並且以其心力所注的專著如《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2005 年）、《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2014 年）、《紅樓夢外：曹雪芹《畫冊》與《廢藝齋集稿》新證》（2020 年）等書，表現實踐所得，作為號召信據。這樣認真的治學態度和普及的分享精神，十分值得學者崇尚。

這篇顧名思義的〈「e 考據」卮言：從曹雪芹叔祖曹荃的生辰談起〉，正是他最新的「說法」之作，其研究過程分明具見，毋庸贅述；其以刊本文字與檔案文件之互證，以及同一詞彙在不同出處者之對比，考定曹荃的生年及生日為康熙元年（壬寅）二月十五日之花朝節，而非前人曾說的康熙二年（癸卯）二月十二日之花朝節，並且釐清曹寅贈弟曹荃詩句中「卯君」一詞的意義，皆為得實無疑；其所用之證據及解釋，近乎竭澤而漁、滴水不漏的境地，而一以「e 考據」方法的應用得之，故此整體清晰有力之外，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實惠亦復釐然可見。

將本文放在「紅學」研究域內，其所考證的問題或不免於費大力於小枝節的質疑，但其實考證無所謂大小，所關係者之大小才是問題。本文對所考證問題的處理，被黃院士演化出的，卻是攸關文史研究「方法學」和研究工具「有效性」的大問題。故此本文所具有的學術參考價值，主要是在於其展現研究方法之事上，對未熟悉「e 考據」之操作者尤有示範意義。

本文不啻是一篇號召同志的「宣言」，熱情洋溢，信念堅定。黃院士的大願是，處於這個新科技推動新觀念和新可能的「e 世代」，「因我們必須做出更高層次的學術成果」，故而應該利用新的相應研究工具和方法。當今的實情是，「大數

據」系統不斷擴大，「數位人文學」方興未艾，而檢索科技日新月異，有朝一日所有可供研究的材料都可以數位形式存於大數據資料庫中，以「e 考據」或類似的數位認識方法駕馭海量資訊，從中觀察事物存在的同異情狀，證實其原本意思並從而合理考論學者自提的特定問題，其好處和必要性昭然若揭，研究者只應用之為必備工具和手段，越是能用會用多用，越便有利獲利多利。

從提高研究能力、拓展學術境界的觀點上看，黃院士所促進的「e 考據」，我想從事學術研究者都只能贊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對事物性質的基本認識：如同一物至少具有兩面，「e 考據」的「方法學」和「工具性」也一樣，有其長處就有其短處，有其強項就有其弱點，所以要它能切當有助於人文之學，就要取長補短和強弱互用；既不要受說著容易做著難之境所窘，也不能沒有不能勉強就不勉強的客觀取態，這樣才能真正適用有益。以下我且就閱讀此文之所感，提出幾個用「e 考據」方法解讀傳統文獻尤其詩文典故上值得注意之處，和黃院士及讀者們一起思考。

讀書貴有疑辨，釋疑義於字裡行間，辨牝牡於驪黃之外，其樂不可言喻。在「大數據」的時代，海量的資訊，任我取攜，固然是好，但面對大量而意義不必盡同的數據，立一詞彙切入檢索，卻很容易會令用者疲於擺脫糾纏，走不出另類的文字障。所以只就「檢索」而言，也得輸入適當的關鍵詞，才能收到確立起點、順藤摸瓜之效。這關鍵詞便是問題意識的凝結和疑問的起點。所以，檢索首先和最大的問題就是提問本身。但為何會「起疑」，所疑是否真的可疑從而值得花時間精力去釋疑祛惑，從什麼地方起疑發問從而進入開始解惑的「考證」程序，都要認真考慮才能有望奏效。

但這個研究起點本身的合理性卻不能是無中生有，而只能是從某種積累中（研究土壤上）才會萌發。換言之，「e 考據」的操作需要有一定的「前檢索」基礎。這基礎涉及的是傳統學問的基本認識、一般常識、專業訓練、功力素養之類的物事，這卻是難以只靠「e 考據」本身便能培養出來的。從另一面看，看似可疑之事，卻不必然都需要加以查考，而盡可以不必疑不疑，以免浪費時間和篇幅。本文所見的曹寅〈聞二弟從軍却寄〉詩，足以說明情況。詩中的「與子墮地同胚胎，與子四十猶嬰孩」句，「紅學」研究者曾據之而有曹寅曹荃是孿生兄弟之說，但既然確知或能知曹寅和曹荃是異母兄弟（曹寅之母為民人顧氏、曹荃之母為旗人孫氏），那麼再考論他們是否「同胚胎」的孿生兄弟也就沒有必要多費筆墨了。

適當掌握詩歌用典的意義，是文史研究上經常遇到的問題。但詩人之用典，往往寓意不一，評家所謂的用得貼切與否，除非質證於作者，實難確定。讀者能會詩

人用意，也能失其用意，這點研究者需要注意，只取典故的本來之意，而未能領會作者的引申或附會之意，用來作證原情時，不免便有失之交臂之虞。舉燭一言，郢書燕說，領取詩歌用典之意，亦復如是。一些出處可尋、原意確定的典故詞彙，詩人套用時卻多是「活用」，所以讀者也需要「活解」才能真正探蹟索隱。像本文考據曹寅贈曹荃詩句中稱曹荃為「卯君」，便是典故活用的一例。蘇軾以其弟蘇轍生於卯年，而在贈詩中特以「卯君」稱之，遂成詩壇典故。曹寅贈曹荃詩句用的「卯君」，卻只是活用指代相親友愛的兄弟關係中的弟弟。詩句中這種用法本身便很靈活，詩人用來稱自己之弟可，用來稱他人之弟也可，視乎相與者的關係和詩意所在，就是用來自稱也無不可。正如本文詳細而明白的考據所示，從前「紅學」學者因見曹寅詩句中有「卯君」一詞，便堅持曹荃必如蘇轍一樣生於「卯年」，從而犯了弦柱膠固之失。由此亦可以認識到，在處理類似的詞彙意義上，需要動用「e 考據」來解決問題與否，首先應問所想知道的是什麼問題，才能免於浪費時間，擾亂精神。仍以「卯君」一詞為例，如果想知道的是關於某人的生卒年分，那麼用「e 考據」來尋找或判斷便是最穩妥的，但如果想知道的只是一對兄弟的倫序或人際關係，那就不必花時間去「竭澤而漁」了。

「e 考據」對於人物傳記信息和詞彙意義研究的用處，明顯不過，但這卻不必然也是對文學作品「欣賞」的用處。這點也必須認識。就以「紅學」為例，專家學者之所以有諸多的疑問和考析、論證，無非是要（一）知道《紅樓夢》此書的創作背景以增加對全書整體的深度認識以及對書中情節的閱讀了解；（二）知道此書「文本」有無刊印上的錯誤，文字有沒有歧義等等，從而肯定不會誤會作者之意，不會影響讀者的了解和欣賞。但從普遍讀者「欣賞」作品處看，不知道和曹雪芹其人其事有關的「學問」，也一樣可以被《紅樓夢》其書其文的內容所吸引，對書中的人物和情境產生想像和作出評價，做得是否有當對這讀者而言都是一種體會、一種享受，正如書中所說的「假到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此中的真假有無，正是小說文學講的「世情」所在，「世情」就是這樣終古時隱時現、有無無有地存在，何必尋根問底，找出流動不居的「真相」，然後才稱痛快。

作為研究方法，「e 考據」的有效性和其所要處理問題的複雜性是對稱的，所以就是用上「e 考據」，用者也要有接受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的心理準備。有些問題我們認為有意義，應該追問，但相關文獻不一定能夠提供「前檢索」基礎。例如，本文兩個主角曹寅和曹荃兄弟名字的典故意義——曹寅字子清；曹荃原名曹宣，別字子猷——可謂其故易知，就如周汝昌所考，大概是取典於《書經·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及《詩經·大雅·桑柔》「秉心宣猶（通「猷」），考慎其相」

等句。以其符合名字相輔協應的原則，所以可取。但如果問曹宣為何改名為曹荃，改名後為何還要保留子猷這一別字？或者是緣於何故曾有新的別字卻沒給記載下來？這類的問題，「e 考據」又應該怎樣進行研究解釋，都是值得思考。

大致上說，老吏斷獄證據確鑿或者酷吏煉獄輾轉證成式的閱讀追尋，用來研究歷史人物的言行，比較容易獲得「真相」。但若用來品嚐、欣賞文學作品，其中情事的況味以及模糊性、神秘感所帶來的難言感覺還能存在多少，都不易說。讀書有理解和同情的不一層次，治學有原情和闡發的不一取向，使用任何工具以求達到目的，其成效只能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定之，「e 考據」或者也是概莫能外的。

極而言之，「e 考據」要面對的難處還是「文獻」本身。文獻本身原是「中性」的 (disinterested)，但在一定的脈絡 (context) 裡卻不必然是「中性」的，而只能是「相關性」的 (related)。實物所能作的證據作用，也是一樣。同樣物證的不同解釋，與典故採用之死活，都是在說者或有「言外之意」，在讀者則是「秉心塞淵」之事。超出格局樊籠之外的文字表達，往往只能以意會之，期求自得，不能三世並現，從此固定。但最低限度，「e 考據」在和傳記及詞彙有關的研究上，能充分發揮全數通檢、對比排除之效，用處實多。黃院士在文末說：「且 e 考據不過是新世代文史工作者解決具體問題（並不止於發掘材料）時所用的一種極有效率的方法，而非其學術研究的全部。」此言質實可取。從事學術研究，不能得魚忘筌，只宜有堅實的筌才能有魚得魚，有堅實而具彈性的筌，才能凡魚皆入，有魚必得。我們希望黃院士將這個文史考據的筌做得更堅固更大小自如，吸引更多的文字漁人增加收穫。